

民国时期旅沪徽州人团体“徽社”研究

蒋含平,张 芳

摘 要:徽州人历来旅居在外者多,民国时期犹然。旅外徽人常有同乡组织,有的以徽州商人为核心,有的以徽州学子为核心。“徽社”是一个由旅沪徽州学子组成的同乡团体,成立于1923年,以联络乡谊、改造乡土为目的,并与皖籍名人胡适、陶行知有着联系。以其机关刊物《微音》为中心考察徽社成立与发展的相关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旅外徽人游离于家乡与都市之间的生存状态,同时也能发现徽社在异乡发挥的旅外徽州学子身份认同、社会交往的功能。

关键词:徽州;徽社;同乡组织;身份认同;胡适;陶行知

中图分类号: K2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4)03-010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XW002)

作者简介: 蒋含平,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安徽合肥 230039);张芳,安徽广播电视台广告中心员工(安徽合肥 230001)。

明清以来,徽州一直是高移民输出地区,所谓“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①。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一座新兴移民城市,是旅外徽州人的大本营。当时的上海,“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18个省区”^②。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这里结成会馆、同乡会等各种同乡团体。据统计,从清末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上海有资料可考的同乡会共计117所,实际数量还不止这些。分省统计,安徽同乡会的数量位列第四,居江苏、浙江、广东之后^③。通过组建同乡团体,旅居上海的徽州人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也逐渐适应了新的都市生活。同时,徽人的桑梓情怀又令他们不忘家乡,始终充满了改造家乡的愿望并不断付诸行动。

据现有资料,旅外徽人组织一般由徽州商人和徽

州学子两类人群组成。本文所研究的“徽社”就是徽州学子组织。对于民国时期旅外徽人组织的研究,学术界关注不多,目前散见有一些学术论文,多为徽州商人团体研究,作为旅外徽州学子团体,徽社在学术界更鲜有关注^④。本文主要以徽社机关刊物《微音》为中心,对徽社及其活动做一个初步研究。

一、作为徽州学子同乡组织的“徽社”

最早的旅外安徽人团体是由商人组织的。据现有史料,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就在北京设立了芜湖会馆,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同乡会馆^⑤。此后,旅外徽商会馆不断出现。如旅沪徽商于清乾隆年间成立的徽宁会馆,以及咸丰同治年间由婺源茶商在上海成立的星江公所(敦梓堂)等。

①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1《赠程君五十叙》。

② 熊月之《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总序,宋钻友《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③ 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91~106页、47~51页。

④ 汪俊康《上世纪初的“徽社”与〈微音〉月刊》(《徽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是目前唯一一篇专门研究“徽社”和《微音》月刊的文章,主要介绍《微音》的内容和特色。其他关于旅外徽人团体研究的文章有王振忠《徽州旅浙硃石同乡会与〈徽侨月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张小坡《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与改造徽州社会的舆论动员》(《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刘小燕《移民报刊视域下的〈黔山青年〉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⑤ 房兆灿《城市·移民·社会:青岛近代同乡组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9年,第2页。

到了民国时期,旅外徽人的同乡组织进一步发展,除聚集地上海有徽宁旅沪同乡会、黟山青年励志会、徽社、黟社、歙县旅沪同乡会等同乡团体或学社外^①,旅外徽人的足迹遍布北京、南京、苏州、镇江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也成立了各类同乡组织。如镇江的新安同乡会、海宁的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等^②。徽州学子团体也开始出现,如1920年北京歙县籍学子组成的“黟麓学社”等。上海的徽社便是这样一个徽州学子组织。

早期的会馆以互助、公益为主。据《上海徽宁恩恭堂缘起碑》记载“宣歙多山,萃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童而出,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岁萎折,殍无资,殍无所,或无以归葬,暴露于野。盖仁人君子所为伤心,而况同乡并者乎!”^③可知徽宁会馆的建立动机是为解决同乡的殡葬事宜。近代以后的同乡组织,除了延续传统会馆的救助功能以外,更成为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各种不同人群广泛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在对外来人口管理、弱势人群的社会救助、调解民事纠纷以及参与市政管理等多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④。其中徽州学子团体,则更多地是在旅外学子的身份认同与交往、对家乡徽州的文化启蒙与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些在徽社中可见一斑。

(一)“徽社”的创建与发展

1923年在上海成立的徽社,是民国时期旅居上海的徽州籍青年学子的同乡组织,持续活动4年左右,在民国时期旅外徽人组织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徽社的前身是“绩溪学社”(以下简称“学社”)。据《绩溪县志》记载“民国9年,胡适、汪孟邹倡议,汪原放、唐子宗、程本海、邵雪如(或作‘奴’,笔者注)主持,城乡知识分子组成绩溪学社,以‘研究学术,介绍新思想,建设新绩溪’为宗旨,办社刊发行省内外。程本

海主编《微音》杂志。”^⑤初期的主要社员包括周德(之)、唐维城、周家玮、程本海、程庸熙、程中一、许家振、胡剑、章笑如、章若含、章若和等十余人^⑥。在“学社”宣言中,他们声称“我们都是在外面求学的绩溪青年,很觉得我们绩溪处在万山之中,是蔽塞地方,要靠乡土的人去改革,非特没有成效,反而弄得一塌糊涂;就是改革的思想,他们也未见得有呢。此刻,能有一线可望的曙光,除非这少数学子互相团结起来不可!倘若这少数学子还不互相团结,做改造社会的先驱,恐怕难免愈趋退化,日返原人时代了。因此,我们深觉有创立这个学社的必要,他底目的从狭义一方面说起来,实不过着手改造区区一个乡土;但从广义一方面看起来,确是联合各处同志共同改造全社会的张本呢!!”^⑦可见,“改造乡土”是“学社”成立的主要目的。初创时期的主要事业包括(一)读书合作社(二)发行书报社(三)调查社会实况(四)演讲会(五)同乐会”^⑧。

由于早期“学社”的社员仅十余人,进行各项事务都十分艰难,“学社”不久决定拓展社员规模并重新改组。据徐子超《程本海年谱》载“同年(1923年),又与绩溪胡梦华(1903—1983)、歙县许士骥等人,联合上海的上海大学、中国公学、震旦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诸校中的徽州籍青年学生及上海各界的徽州籍青年知识分子,组织‘徽社’并出版《微音》月刊。”次年元旦,“学社”正式更名为“徽社”。

这个改动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同时也表现了组织成员更高的视野和期盼。主要发起人之一程本海有这样的表述“今年的元旦,本社在南京开重要会议,议决三大要点:(一)原定‘绩溪学社’名称范围太狭,器量太小,而且容易使人误会;故议决改为‘徽社’二字。在狭义方面言之,共谋徽州六县的幸福;广义言之,共谋

① 参考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新闻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以及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新闻志》,第48~69页。

③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2页。

④ 参见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邱国盛《从国家让渡到民间介入——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谢忠强《试论社会转型与社会整合中同乡组织的民间介入——以清末民初上海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艾萍《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近代社团组织》,《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3期。

⑤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569页。关于绩溪学社成立的时间,县志的记载可能不准确。徐子超在《程本海年谱》(《徽学通讯》1990年第1期)中有另一种表述:“(1923年26岁)联络绩溪在沪各大学求学的青年周德(之)、周家玮、唐子宗、邵雪奴、程中一等,组织‘绩溪学社’,以‘研究学术,介绍新思潮,建设新绩溪’为宗旨。”另笔者根据《微音》现存资料推断,“绩溪学社”成立时间应为1923年,具体可见《微音》月刊第14期所载程本海《一年来本社之回顾与前瞻》、邵雪奴《今后的〈微音〉》。

⑥ 《绩溪学社简章》,《微音》旬刊第2期,1923年5月21日,第4版。

⑦ 《绩溪学社宣言》,《微音》旬刊第2期,1923年5月21日,第4版。

⑧ 《绩溪学社简章》,《微音》旬刊第2期,1923年5月21日,第4版。

安徽全省的福利;再广而言之,共谋国家的福利。”^①另一位发起人邵雪奴也表示“在以前的宣言上,我们团体的最高目标,是在改造乡土。现在,我们‘绩溪学社’改为‘徽社’,那么我们所悬目标的范围,当然要由绩溪推广而至于其他六县。但我们最终的目的,实在并不限于此区区六县。”^②可见他们由改造乡土进而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

虽然只是同乡团体,但徽社内部的组织管理却颇为规范。绩溪学社时期,社内设有编辑、发行、庶务、会计、同乐会等科。更名“徽社”后,顺应规模的扩大与发展,管理机构也不断调整,建立了总务、编辑、发行、会计、介绍、教育、调查、庶务、娱乐各科。负责各类社务的干事员,均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徽社也因此形成了每年春、秋季都要开选举大会的惯例。徽社还将每届大会的情形和选举产生的新干事名单刊登在最近一期的《微音》月刊上进行公告。当时上海的《申报》就曾对此进行过报道^③。

随着规模的日益扩大,徽社也不断向外发展。后期除上海总部外,还在杭州、南京、北京、汉口等地设有分社。各地的社员之间,分社与总社之间,都保持着密切往来,这使得徽社这一同乡组织在空间上已打破地域限制,“形散而神不散”地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至1927年终止活动前,徽社成员已经发展至数百人,“论精神则已巩固团结,由数人而至数十人,数百人,惨淡经营,得有今日者,实群策群力之效耳”^④。对比《微音》前后期的社员通讯录可以发现,徽社后来又新增加了汪原放、柯湘帆、柯莘麓、方业韶、汪静之、邵亦群、许悦音、黄叔鸾、张国良、鲍剑奴、罗纯夫等,他们中很多后来都成为当地的名人。

徽社的创办与成长还得到了当时皖籍文化名人胡适、陶行知的支持。胡适、陶行知同为徽州人,与徽社中一些成员保持良好的私谊。如社员汪静之是胡适的学生,无论在学习和生活上,胡适都曾给予悉心帮助,二人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⑤。社员汪原放亦与胡适私交甚好,从胡适的来往书信中便能感知二人的密切关系。而《微音》的主编程本海是陶行知的得意门

生,陶行知曾有言“他与我本是好朋友,我到上海,时常与他会面。”^⑥程后来更是追随陶行知的脚步,参与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并终其一生在教育事业上。因为这样的联系,胡、陶二人不但担任了徽社的顾问,还亲身参与相关活动。

(二) 机关刊物《微音》的创刊与演变

民国时期的旅外徽人组织多创办有团体机关刊物,除了供联络乡谊、传达消息之外,还寄托关怀故里、启蒙家乡的桑梓情怀。在北京,有黟籍学子组织“黟麓学社”创办的《古黟新语》(1921年),以继承“五四”精神为宗旨,传输“爱国、民主、科学”进步思想,讨论问题多“以关切桑邦者为限”^⑦。在江浙一带,有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所办的《徽侨月刊》(1927年),以形成健全的舆论,引导徽州人“走入光明大道,达到新徽州”为目的^⑧。上海作为旅外徽人的聚居中心,更是涌现了一批徽人刊物,如黟山青年励志会创办的以“改善黟县社会”,“谋建设事业,造成新徽州”为宗旨的《黟山青年》(1922年)等。与这些团体一样,徽社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微音》。

《微音》是一份言论为主、兼顾文学的综合性刊物,“宗旨在主持正义,以切实的批评社会,唤醒民众,促进民治的中国,对于阻止社会进化的陈腐的思想,不遗余力的加以攻击!”^⑨初创时是旬刊,采用对开报纸式样,每期四版。内容多以讨论学理和介绍西方思想或西学知识为主,伴有少量评论,时常刊登社员自己创作的诗歌。编辑部设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内,并在上海、杭州、芜湖、绩溪等地设有分销处。由于早期成员不多,出版旬刊的工作十分艰难,“当时发起的同志不满十人,且都是青年,或为校中功课所缠,或为职务所限,那有余暇办报?所以当《微音》旬刊每次出版时,我们三四个负责的至少有两三夜的工作,每次总要至深夜二时三时才得安眠,这样的工作,直到第十三期停刊才止”^⑩。旬刊出至十三期时,终因人手不足、经费拮据而告停刊。

为不使努力中道废止,1924年,随着“学社”更名

① 程本海《一年来本社之回顾与前瞻》,《微音》月刊第14期,1924年7月1日,第3页。

② 邵雪奴《今后的〈微音〉》,《微音》月刊第14期,1924年7月1日,第1页。

③ 《徽社昨开大会记》,《申报》1925年9月21日,第15版。

④ 《征求社员缘起》,《微音》月刊第31、32合期,1927年1月22日,第8页。据徐子超《程本海年谱》记载,《微音》月刊“出至第35期停刊”。笔者手头现有《微音》最后一期为1927年1月22日的31、32合期,因此可做如上推断。

⑤ 汪静之《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师生情谊》,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一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

⑥ 徐子超《程本海年谱》。

⑦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新闻志》,第15页。

⑧ 王振忠《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与〈徽侨月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⑨ 《我们的广告》,《微音》月刊第20期,1925年2月。

⑩ 程本海《一年来本社之回顾与前瞻》,《微音》月刊第14期,1924年7月1日,第2~3页。

“徽社”,《微音》也以月刊的样式重新问世。“今年的元旦,本社在南京开重要会议,议决三大要点:(一)原定‘绩溪学社’名称范围太狭,器量太小,而且容易使人误会;故议决改为‘徽社’二字。……(二)同人等都有职务在身,并无充分余暇,因此议决改旬刊为月刊,注重内容,作公正的批评及介绍切实可行之学说;并增加文艺以养成文学志趣。”^①

改版后的《微音》首先改变了刊期,由原来的旬刊改为月刊;同时增加了内容,新辟了社评、言论、研究、调查、文艺、小朋友、杂感、社务报告等多个专栏,言论和文艺篇幅明显增多;刊物的式样也彻底改变,由原来的报纸形式改为大32开的杂志形式,且每期的刊名均由不同名人(多是皖籍名人如胡适、陶行知等)题写,封面字体颜色各期不同,字样亦时常变换。总体看,改版后的月刊无论在版式、内容还是篇幅上,都大大超越了原先的旬刊,渐受同乡欢迎,“《微音》自出版以来,颇得各地同乡欢迎,尤以本期(第廿六期)内容精彩异常,印刷精美,极得各方赞许,声誉为之大振”^②。月刊出至第35期,于1927年终刊。

二、“徽社”的主要功能 ——异乡徽人的认同与交往

现有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在沪的同乡组织,与清末相比在功能和内涵上有了不少变化,由最初的互济性、公益性,向身份认同、社会交往等方面转变。作为旅外徽人组织,徽社承载了异乡徽州学子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功能。

(一)“徽社”群体的身份认同

1. 地缘认同:都市外乡人

家乡在传统中国是个人身份的关键组成部分。有研究表明,乡土观念是支持同乡组织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精神力量^③。对于从乡村走向都市的移民而言,同乡认同既表达了与故土的精神联系,又隐含了共同面对都市生活的现实与情感需要。

徽州人离开家乡,从传统的“熟人社会”来到一个彼此陌生的都市,上海的车水马龙和喧嚣繁华,令自幼生在山水田园小镇的“徽州人”感到极为陌生。他们在痛苦的适应过程中表达着种种不适。“上海这地方,完全是个商场;市井喧闹、人烟稠密。因工厂众多,所以空气也变成混浊有煤灰的了。一天所见的只是工人商

店,以及车来车往的富商大贾。真个是红尘万丈,看不见半点天然景色。”^④“许多没有到过上海的同乡,把上海看作遍地黄金大发财源的地方……等到到了上海,不是投亲不遇,就是亲友无能为力。”“上海生活程度日高一尺,一切费用,比家乡高出数倍,就算是在上海得着一个位置,然而除了膳宿费用以外,所余无几了。”^⑤生活的艰辛令旅居上海的徽社学子体会到,这座城市的繁华并不属于自己。

不见了熟悉的山水田园和风土人情,在新的都市里又找不到安放自己身心的恰当位置,寻求在异乡的身份归属与认同,就显得尤为迫切。徽社之成立,其核心价值也在于此。

然而同乡组织似乎并不能让他们把漂泊的心安放在这个都市,他们在融入城市和回归家乡之间徘徊,而在家乡与城市的徘徊之间,他们似乎更多地倾向与家乡的情感联系。例如,他们不定期派社员返乡且密切关注家乡的教育、交通等事业,却甚少关心旅居地上海发生的大小事态,他们创办《微音》同样是为了联络乡谊和改造家乡。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身居异地的徽社群体总在找寻着与家乡的联系,即使他们在上海有丰富的社交活动,但这些活动仍主要在“同乡”间进行。或者我们可以说,虽长期侨居于斯邦,徽社群体却始终“以都市外乡人”的姿态徘徊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边缘”。

2. 学缘认同:新式学子

社会转型时期,各类事物都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传统乡村的旧式私塾还未匿迹,各类新式学堂就已纷纷设立。徽社的很多成员,都是先在家乡念过私塾或接受初等教育,后来上海(或其他城市)进入新式高等学府接受教育。从一份“社员通讯录”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他们所在学校的情况:“王恒纪/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石原镐/上海南站大同大学,江广智/杭州四条巷中医专门学校……汪湘岑/上海南站大同大学,汪家驹/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汪育松(菊农)/芜湖二街徽州公学……邵雪奴/上海卢家湾震旦大学……胡乐丰/上海南站大同大学,胡裕杰/上海日晖桥南洋中学,胡家俭/南京东南大学,胡广平/同前,胡冠英/天津南开大学,唐维城(子宗)/上海江湾复旦大学……”^⑥同时,在治学方向上,商学、医学、美术、外语等极具现代意义的

① 程本海《一年来本社之回顾与前瞻》,《微音》月刊第14期,1924年7月1日,第3页。

② 《新年同乐会》,《微音》月刊第27期“社务报告”,1926年,第44页。

③ 参见宾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1~5页。

④ 程庸熙《一封寄给想来上海求学的青年的信》,《微音》月刊第14期,1924年7月1日,第20页。

⑤ 罗纯夫《敬告想来沪的同乡》,《微音》月刊第16期,1924年9月,第34页。

⑥ 《微音》月刊第14期“社员通讯录”,1924年7月1日,第24~26页。

学科跃然呈现,如周德之“民国14年(1925)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商业系”^①,柯莘麓“1922年入上海东亚医科大学”^②,胡梦华“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③,许士骥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④……在接受了“孔孟”“程朱”之儒家经典熏陶之后,再到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接受新式教育,这种中西交融的教育共性,使得这些学子有着亲近的学缘关系。

相仿的年纪、相似的求学经历、相同的生活环境,让这批新式学子集结在了徽社周围,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共同追求在新都市的生活与理想。“谁都信得现在徽社的分子,大都是求学的青年,抱着正义;服从真理;无党派色彩;有改造的眼光!”^⑤寥寥几句,已描摹出一幅徽社学子群风华正茂、气宇轩昂的像图。

值得一提的是,徽社成员相当一部分在毕业后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其中一些主要成员甚至成为当地或全国的知名人士。《微音》主编程本海“1926年入中华书局编辑所,1927年辞职去南京晓庄大学部学习,1948年应邀赴台湾,任教育厅督学”;胡梦华“192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安徽省立第一师范校长”;许士骥“毕业后历任江苏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四川重庆育才学校教员。20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建筑系教授等职,参与创办歙县行知小学,并任校长”;柯莘麓“1924年后任职于武汉大学、上海中国国医大学。1930年返乡开设诊所,建国后,任乡联合诊所医务主任、县医联会执委”^⑥。这些走出来的徽州学子,也将徽社的历史地位提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层面。

(二) “徽社”群体的社会交往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这里旅居者众,同乡组织也多。同乡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旅居者提供一个交往的平台,营造一个交往的空间。就徽社而言,其群体的社会交往是由内而外分几个层次展开的。

1. 社员的内部往来

在具体社务中,“联络乡谊”作为徽社的主要目的之一,超越了“改造乡土”而被置于首要地位。对团体

凝聚力的强调使他们十分注重社员间的往来。徽社群体内部交往中,机关刊物《微音》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平台作用。

(1) 联络社员的“社员通讯录”和“社员消息”。

凭借广泛的发行渠道和到达率,《微音》在联络社员方面充分发挥了平台和纽带作用。《微音》杂志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刊物的末尾或封底刊登“社员通讯录”或“社员消息”,公布每位社员的通信地址。在笔者现有的资料中,第14期、第15期、第26期以及31、32合期上均有类似内容。如第14期的“社员通信处一览”悉数刊登了汪乃刚、汪原放、周德之、邵雪奴、胡梦华、胡素月、许士骥等众多社员的通信地址^⑦。在第28期上,还刊登了他们整理的“全体社员通讯录”。

当有社员的工作或地址发生变动时,编辑人员也会及时编发“社员消息”广而告之。如第25期上有“周德之君今夏毕业于中国公学商科,下学期被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聘任编辑。胡家健君下学期应河南开封第一师范之聘担任教职。……许叔良君下学期在上海南光中学担任教职。邵雪奴君现在考入邮局为邮务员”^⑧。此外,“社员消息”中还刊发海外社员和新社员的消息,甚至表达对社员身体状况的关注,如第23、24合刊的“社员消息”: (一) 海外社员周其庠君最近来信嘱将他的最近通信处刊布于此,以告诸同志。Herrn Chichiang chow\Legation China\Berlin W15\Uter Moska。(二) 本社社员章若和女士,是绩溪人,于前年来沪,肄业本女学,平日好学,师友同钦。不幸于四月间一病不起,同人闻悉,痛悼良深! (三) 歙县许叔良君、休宁黄怜生君对于本社宗旨及一切组织,甚表满意,已于上月间经干事会通过,加入本社为社员。”^⑨

由于徽社成员散处各地,为促进异地社员多加联络往来,编辑人员也时常在刊物上呼吁“本刊为社员互通消息起见,希望诸同志随时将本人或友人(社员)近况见告,以使刊布于此”^⑩。这些“社员消息”为社员之间的交往提供了极大便利,在群体的凝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徽社”组织的集体活动。

①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第887页。

②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第894页。

③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第902页。

④ 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138页。

⑤ 鲍剑奴《绩溪教育的危险》,《微音》月刊第17、18期合刊,1924年10月,第9页。

⑥ 以上据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

⑦ 《微音》月刊第14期,1924年7月1日,第24~26页。

⑧ “社员消息”,《微音》月刊第25期,1925年8月30日,第44页。

⑨ “社员消息”,《微音》月刊第23、24合期,1925年7月25日,第70页。

⑩ “全体社员公鉴”,《微音》月刊第31、32合期,1927年1月22日,第86页。

为使旅外同乡多有机会沟通交流,联络和增进彼此情谊,徽社还时常开展同乐会、餐会、游艺会等集体活动,其中聚餐、同乐会是最为常见的形式。

现有资料可见,每年元旦,徽社都会组织全体社员聚餐,并在餐后表演各种节目,从《微音》相关记载中可见每次聚餐的时间之长、场面之热闹。如第20期《微音》上记载了徽社同人欢度1925年元旦的热闹场面:“阳历元旦,本社社员(上海总部)假座第一春徽馆举行聚餐同乐会,一以庆祝元旦,一以联络情谊。……于七时入席,觥筹交错,欢饮大嚼,笑聚一堂,难得之盛会……散会已十一时,兴尽而散,极一时之盛也。”同乐会上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先为严个凡君的新奇幻术……为观众赞赏不置。次为来宾顾月贞、顾荣贞姊妹之双簧,其言辞以讽刺口吻,而表情又活泼,颇感动人,掌声不绝于耳。最后为严个凡、与今昆仲的丝竹,二君研究有素……抑扬顿挫,满室生春,尤以能陶养人性情,如入清凉境界,消除一切烦恼为可贵也。”^①

1926年的新年同乐会同样热闹非凡:“一月十六日(星期六)下午六时假座第一春徽馆举行聚(餐)同乐会,并由社友表演游艺多种,以娱乐兴,而联情谊。……餐毕,由各同志表演游艺,如严个凡、严与今、黄叔鸾三君之国乐,胡蔼卿、严个凡、黄叔鸾、胡洪炳四君之京曲,张国良君之魔术等,直至十时尽欢而散,颇极一时之盛。”^②

新年、元旦都是象征团圆的中国传统佳节,徽社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举办聚餐、同乐会这样的集体活动,对“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都市异乡人而言,既能够排遣乡愁,又增进了同乡间的情谊。

此外,在欢迎顾问胡适、陶行知来社内演说时,徽社也会组织社员聚餐。徽社还举行过以筹集资金为目的的游艺会。

2. 外在的联结:徽社范围外的社会交往

除了内部社员间的交往,徽社还作为一个组织开展对外的交往。

(1) 与皖籍名人胡适、陶行知的互动。

作为徽社的顾问,胡适、陶行知在徽社成长过程中

不仅发挥着“精神领袖”的作用,还亲身参与徽社的相关活动,成为徽社外部交往最亲近的层面。

胡适和陶行知对社务都给予过指导。前文已述,在“学社”发起与成立之时,胡适就参与指导^③。对于机关刊物《微音》的编辑工作,陶行知也曾反复给予指点“办报不难,难在议论公正,消息真实,倘同人对此二点继续注意,必能增加月刊之价值与影响。”^④“《微音》月刊希望继续出版,惟材料须精选。”^⑤

胡适、陶行知还应邀来社内演讲。现有相关资料显示,胡适有两次演讲(1923年11月中旬、1925年10月18日),陶行知有三次演讲(1925年5月10日、7月25日,1927年1月3日)。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胡适的演讲重在与年轻学子谈人生和文化。他的演讲受到了社员的高度重视和欢迎。第26期《微音》月刊详细记载了徽社欢迎胡适演讲的情形“十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时,本社假座三马路中西女塾大礼堂开会欢迎本社顾问胡适之博士并请演讲。……胡先生此次由武汉来申休养,本谢绝一切演讲,因与本社有特殊感情,得蒙惠允,不胜荣幸!”^⑥演讲之后,胡适又与徽社成员一道聚餐并合影留念,在与大家的谈笑间尽显风趣,给社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社员赞叹道“先生虽为有名学者,然毫无时下闻人习气,来去皆拟步行,徽社社员以如此殊失推崇学者之意,而先生又力戒奢费……则先生之俭德,又不可及矣。”^⑦

身为教育家,陶行知特别关注家乡教育问题,演讲侧重于家乡教育的相关话题,并对旅外学子如何改造徽州教育、建设家乡提出具体建议,如要求徽州少年回乡后做三件事“一是本村生活之调查,二是村民须知之演讲,三是提倡平民教育。”^⑧此外,对于徽州的交通事业,陶行知也给予了关注。这些演讲内容后都被主编程本海记录整理,刊登在《微音》上供全体社员参阅学习。

胡适和陶行知还在《微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胡适发表的文章(诗歌)有《哲学与人生》(1923年旬刊

① 《微音》月刊第20期,1925年2月,第30页。

② 《微音》月刊第27期,1926年,第44页。

③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第569页。

④ 《陶行知先生致社员程葆成君的信》,《微音》月刊第23、24期合刊,1925年7月25日。

⑤ “社务报告”,《微音》月刊第25期,1925年8月30日,第44页。

⑥ 《欢迎胡适之博士》,《微音》月刊第26期“社务报告”,1926年1月1日,第40~41页。

⑦ 空我《欢迎胡适之先生琐记》,《微音》月刊第26期,1926年1月1日,第33页。

⑧ 陶行知《徽州少年回乡运动》,《微音》月刊第23、24期合刊,1925年7月25日,第5页。

第10期^①、《读书》(月刊第25期)、《竹叶青》(月刊第26期)、《我也来谈谈东西文化》《龙井》(月刊第27期);陶行知发表的文章有《徽州少年回乡运动》(月刊第23、24合期)、《我对于屯昌汽车路办理的意见》(月刊第25期)、《我之学校观》《天将明之师范学校》(月刊第29、30合期)、《徽州人的新使命》《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及建设新徽州之使命》(月刊第31、32合期)。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文章是首发在《微音》上的。如胡适的《龙井》与《竹叶青》两首诗,据《微音》编者介绍,“承胡先生检出旧作《竹叶青》与《龙井》两首白话诗(均未发表过),嘱先发表”^②。陶行知的《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徽州人的新使命》《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及建设新徽州之使命》也都是先发表在《微音》上,后才在陶行知自己主办的《中华教育界》上发表。

从上述材料可见胡适和陶行知对于徽社这个家乡学子组织的热情支持,以及徽社成员对故乡文化名人的精神倚重。

(2) 与其他徽人团体的联络。

民国时期旅沪徽人成立的同乡组织较多,除同业公会外,还有本县同乡会、徽宁同乡会、各县会馆或徽宁会馆,乃至安徽同乡会,徽州人可参与的组织因此也交叉重叠,从而织就一张庞大的地缘、业缘网络^③。徽社亦是如此,该社一些核心社员如曹志功、邵亦群、许士骥、许作人等,还分别是徽宁同乡会、歙县旅沪同乡会的理事或社员。这种交叉重叠的同乡网络,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各同乡团体的相互交往。特别是在改造家乡、建设新徽州等方面,旅外徽人尤其同声共气。

当时的徽州交通不便,对徽州人的出行与各类事业的发展均造成阻碍,程本海曾在《微音》上发表《论徽州亟宜创办长途汽车》指出“吾徽处万山之中,交通极感不便,陆则山道间阻,水则河道不深,故舟车需时。……且因运输不便,坐令许多富源,难以发展。”^④因

此,发展交通成为旅外徽人极力筹划和鼓吹的重要内容。徽社在此方面表现积极。除了做文字的宣传鼓吹外,他们还联络在当时徽人团体中颇具影响力的徽宁同乡会,共同签署《致杭州屯昌汽车路公司筹备处之公函》,后又会同杭州的同乡,积极策划发起徽杭互通长途汽车事宜^⑤。在听闻家乡遭军阀侵扰后,徽社立即与其他旅沪徽人团体一起,加入了以徽宁同乡会为首的和平委员会^⑥。当家乡名人柏文蔚(烈武)来沪时,徽社则作为组织者发起了欢迎活动,“于十一月卅日联合上海各公团(共四十三公团)开欢迎大会,欢迎柏烈武先生于宁波同乡会四楼……到会者皆素有声望之团体,颇极一时之盛!”^⑦

与同乡团体的频繁往来,有助于徽社与其他旅外徽人团体彼此间构筑同乡情谊,树立正面的徽人群体形象。

许纪霖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施加公共影响^⑧。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与传统书生相区别的新式学子群体,徽社成员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一种“公共性”的特点。这种联络与交往对于这批学子置身于上海这个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都市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这批学子中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最后都有了自己较好的职业发展,有些人在不同的领域产生了影响。然而,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尽管徽社的外部交往活动很多,且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但如果细究其交往的主要对象,可以发现无论是文化名人还是其他团体,均未超脱地缘纽带的“捆绑”。在城市与故乡之间,徽社群体的情感天平明显向故乡倾斜,显示出一种既想融入城市又走不出家乡视野的矛盾状态。这种两难的状态在近代旅外徽人团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这是胡适1923年11月中旬在上海应绩溪学社诸同乡相邀作的演讲,由周德、程本海笔记,送胡适修改后,刊载于1923年11月21日该学社主办的《微音》旬刊第10期上。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演讲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2页注释。

^② 见《微音》月刊第26期,1926年1月1日,第25页。笔者在《胡适全集》中,并未发现收录有《竹叶青》这首诗。

^③ 参见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④ 程本海《论徽州亟宜创办长途汽车》,《微音》月刊第21、22期合刊,1925年4月25日,第10页。

^⑤ “社务报告”,《微音》月刊第25期,1925年8月30日,第43~44页。

^⑥ 《旅沪同乡之和平运动·大会之决定》,《微音》月刊第31、32期合刊,1927年1月22日,第61页。

^⑦ “社务报告”,《微音》月刊第19期,1925年1月,第44~45页。

^⑧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